

學思與生涯

金耀基對話錄

08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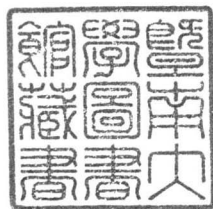
OXFORD

CS2

20104

學思與生涯

金耀基對話錄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uckland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Hong Kong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New Delhi Shanghai Taipei Toronto

With offices in

Argentina Austria Brazil Chile Czech Republic France Greece

Guatemala Hungary Italy Japan South Korea Poland Portugal

Singapore Switzerland Thailand Turkey Ukraine Vietnam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First published 2008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學思與生涯

金耀基對話錄

ISBN 978-0-19-800185-0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作者與幼孫雋軒攝於二〇〇七年

序

這不是一本我寫的書，但可以說是一本我是半個作者的書，只是我非手寫而是口說的。《學思與生涯：金耀基對話錄》是一本八位先生、女士對我所作的訪談錄。認真說，訪談錄中好多篇，特別是識學兼勝的劉夢溪教授和文采風流的侯軍先生的灑灑洋洋的長篇，與其說是對我的訪談錄，不如說是我們的對話錄。一點不假，在對話的情景中，人的思維特別活躍，在彼此的叩問中，常能激發新的話語，新的想法，我確實享受到對話的樂趣。

這本對話錄，寫作的時間跨度有三十年之久，最早的在一九七七年，最近的是二〇〇八年。當年剛踏入中年的我，今日已是過了「古稀今不稀」的七十之齡又三年了。從文章內容來說，對話錄是循着我而立之年以來的學術思考和著述展開的。附錄中邱秀文、韋涓和鍾惠民三位的訪談，都因對我早年發表的中國現代化的主張和思想感到關切和興趣，寫了許多推美的話。

誠然，我的學術志趣，自一九六六年寫《從傳統到現代》到二〇〇四年出版《中國的現代轉向》，四十年來，一直是以中國現代化、中國的現代性，以及與之攸關的中西文化的衝突

與交融問題為主線的，讀者在劉夢溪教授的〈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蒼涼與自信〉，侯軍先生的〈從香港文化看中西文化的衝突〉及王辛女士的〈建構既有全球性又有中國性的現代文明秩序〉的三個長篇中是可以見到的。

我四十年來的生涯，不外乎是大學教學、研究與行政的生涯，我不止在大學裏做研究，還研究「甚麼是大學」，故有《大學之理念》一書，大學在中國之出現，是中國「現代轉向」中學術、文化與教育上的大事，大學之於中國現代化事業，固是一關鍵；大學之於中國現代性或中國現代文明秩序之建立尤攸切相關，李懷宇先生的〈中國的現代轉向要靠第一流大學〉的訪談記錄很可以看到我這方面的想法。我的學術專業是社會學，但對文學始終是心已所愛，因此教研之餘，三十年來先後寫了《劍橋語絲》與《海德堡語絲》二本散文集，二〇〇四年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後，多了一份自在與自由，又寫了第三本語絲——《敦煌語絲》。這是我學術生涯中的另一片天地。斯浩先生的〈從劍橋到中大，從文學到社會學〉便是我們環繞文學與社會學的對話錄。

牛津大學出版社的編輯最早提議我出版這個文集，現在文集要出版了，我很感激他的心意，在這裏，我也特別要對八位訪談過我，與我對過話的先生、女士表示我的敬意和謝意。

二〇〇八年五月於香港

目 錄

ix 序

- 1 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蒼涼與自信
- 41 從香港文化看中西文化的衝突與融合
- 93 建構既有全球性又有中國性的現代文明新秩序
- 113 中國的現代轉向要靠第一流的大學
- 131 從劍橋到中大，從文學到社會學

附 錄

- 151 為中國現代化求答案
- 159 傳統、現代化與知識分子
- 167 學術生命與智慧的開啟

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蒼涼與自信

訪談者：劉夢溪

金耀基教授是我非常敬佩的文化—社會學者。九十年代以來，因了各種機緣曾多次晤面。他的通明的理性精神，敏銳的藝術感覺能力，以及對時事世運的洞察，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初，我赴臺參加中央大學舉辦的學術會議周，並應邀到中央研究院作短期訪問。臨行前與金先生聯繫，希望返程過港時能有機會作一次專門的訪談對話。金先生慨然應允我的請求，並把時間安排在十二月的三和四日的兩天下午，每次談三至四個小時。還有一次晚餐也作了長談，在座的還有劉述先教授和童元方女士。所談內容比較廣泛，但主要是圍繞文化與社會問題，探討在二十世紀的大背景下如何完成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建構。這是一九九二年我與余英時先生訪談的繼續，切入之問題亦不無前後相連帶和相衍發的關係。訪談時內子陳祖芬女士在場，她有一份比我記錄得更完整的筆錄，為嗣後整理成文提供很多方便。只是農曆丙子，肖鼠躡窰，時論忌諱訪談；加之我們《中國文

化》雜誌，刊期長，出版慢，第十三期既未來得及刊出，待到這第十四期出版，已是一九九七年春天了。訪談的語境多少發生一些變化。但大背景沒有變，我們所談的問題在可預見的將來還不能說是已經過時。而且延宕的時光為探討新的問題提供了可能性。當訪談錄送請金先生審定時，我們加了一個題尾，增補了關於香港九七回歸和前景展望的內容。此一部分記錄下來的金先生的談話，反映出一個社會學家對一個已構成世界時事焦點的熱門話題的極冷靜的觀察，語言凝重而智慧，足可驚俗警世，發人深省。為了這次訪談，金先生不只安排得周到，同時在刊佈前對訪談初稿作了大量細心的潤正、補充和釐定，這佔去他許多寶貴的時間，我在愧疚之餘謹向他遙致謝忱。

歐洲是現代化的第一個「個案」

- 您在我個人以及一般知識界人士心目中，主要是一位文化—社會學者。當然您關心的領域比人們的閱讀印象要寬泛得多。您與其他從事同一領域研究的學人的不同之處，是您的思考更具有現實感和現代感。您的《從傳統到現代》、《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兩書，內地知識界也很重視。您似乎想用現代的方法解開傳統的鎖鏈，冀圖消除沉重的中國人的現代緊張。如果我的理解不錯的話，您的

文化—社會學研究的背後，一定貫注一種學術精神。請您談談您的專業選擇過程和您的文化—社會學研究的精神旨趣。

- 我的研究主要環繞着中國的現代化問題。而現代化不能不碰到文化問題。對長期以來的中西文化論爭，開始我只是個旁觀者，後來也情不自禁地參與進去。但我發現，整個問題不是中西新舊文化論戰能夠解決的，它是一社會變遷與發展的問題，所以我想改變論爭的語境。這是我在三十一年(1966)前發心寫《從傳統到現代》的緣由。

我對社會學發生興趣，是一九六四年去美，接觸到了社會學的新理論，尤其是在哈佛柏森斯(Parsons)的理論。當時社會學理論對我有影響。所以我的《中國的現代化》那一篇，有我的樂觀性，也可以說有些過份樂觀。不過，我也對現代的有些趨勢憂慮。所以，我也寫了《現代人的夢魘》。但總體言，我覺得中國必須要現代化，這是我們唯一的出路。不過當時我對現代化儘管非常殷切，可以說是擁抱現代化，但始終沒有把傳統與現代對立起來。墨西哥有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詩人帕斯(Octavio Paz)說，墨西哥是「命定地現代化」，是「被詛咒地去現代化」，可也是唯一的理性出路。中國何嘗不是如此？現代化總是會帶來問題，但這是唯一的出路。除了現代化，我們沒有別的路可走。問題只是我們應如何現代化，不是要不要現代化。

中國向來是一個有自己特殊的文明秩序的國家。但十九世紀末葉，中國傳統的文明秩序瓦解了，需要建立一種新的文明秩序。怎麼建？從政治、經濟、日常生活，沒有一樣不在解構，也沒有一樣不需重構。當時是清末，這種變化是極為深刻的，所謂二千年來未有的大變局。〔劉：「巨變奇劫」〕王韜看到了這種變化是文明秩序的變化，不是朝代的變化。儘管很多人對中國傳統的某些方面很執著，但是也在變，不得不變。往哪裏變？現成的文明秩序擺在那裏，這就是西方的新文明秩序。需知道，西方本身的傳統秩序也經歷了強烈的變化過程，這變化先從歐洲到美洲，等到西方的現代化通過軍事與經濟敲叩中華帝國的大門時，西歐與美國已被現代化全面改造過了。現代化與西方化之所以常相混淆，原因就在這裏。說到底是歐洲先走向了現代化，在世界文明秩序裏建立了最早的一種現代性模式，這也是目前唯一的支配性的模式。由於當時西方現代化是以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兇毒面目出現在中國，所以，中國一方面不得不「西化」，另一方面在心理上總有厭懼感，總有抗拒意識。

如果不出現西方的現代型的文明秩序，今日世界的情況會有所不同。因為這一個文明秩序發生了全球化的影響。今日不論在那個城市，西方的、東方的，都有現代的東西，如機場、五星級酒店、大學、工廠，軟件的、硬件的，相

同性很大，它影響到我們整個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中國的一個知識分子，不可能不為自己的國家出路思考問題。十九世紀以後，為甚麼那麼多知識分子總是不知不覺被拉進大的文化論爭？從早期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戊戌維新，無非是為國家找出路。曾國藩或者還可以說是為了清廷的利益。〔劉：文化的考慮的成份也有，他想保持住延續幾千年的中國固有的文明秩序〕到了新文化運動，就為的是整個中華民族了。但中國之為中國靠甚麼？沒有中國文化還能形成中國？為了中國的發展可以犧牲中國文化？直到今天，這些問題仍然存在，有時還會改變方式，和民族主義的問題連在一起。

□ 這有幾種情況：一種是為了尋找新的，於是便全部拋棄舊的；一種是既要新的，又要舊的，但找不到整合的途徑，陷入兩難；還有一種是為了既有文化秩序的失落而痛苦，如王國維就是這樣。陳寅恪說，越是為中國文化所化之人，當這種文化價值衰落之時，便越感苦痛，所以王走向了自殺的道路。在王國維之前，梁漱溟的父親梁濟也是自殺的。

■ 王國維的死有深刻的個人層次的因素，當然他的選擇的文化意義不可低估。印度的甘地，也是受現代的衝擊，但他不想工業化，為的是要保持住印度的文化認同。尼赫魯不是這樣，他也為印度，但卻推動工業化，走向現代化。胡

適，絕對為中國。但他提出「充分世界化」，也就是西化。所以如此，因為西方現代的模式已經擺在那裏，成為唯一的參照系，沒有別的路好走。〔五四的知識分子是不惜去掉中國文化以救中華民族的〕直到今天，談民主、人權，爭論的也還是中西問題。新加坡處罰美國少年打屁股的事，美國人認為不文明，新加坡說美國人才不文明。整體地講，在二十世紀，西方現代的模式不知不覺地成為現代文明秩序的主導，這裏當然涉及文化霸權的問題。

文明秩序的「舊」與「新」

- 今天談精神文明，首先應該問是甚麼精神文明。十九世紀後，中國的固有文明遇到西方的挑戰，一敗再敗，已被中國知識分子的主幹所拋棄。四九年以後，馬克思主義在大陸成為主流，但如果說開來，那也是一種西方思想，只不過是「反西方的西方主義」罷了。而且認為在理念上已經高過資本主義，中國文化是否需要保存的問題便不在視野之內了。
-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在一定意義上，是以犧牲自己民族固有傳統為代價的。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的一段話：「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這裏所謂的兩個「決裂」，便成了一

個時期割裂和排拒民族文化傳統的正當的理由。還涉及一個流行頗久的口號，即對傳統文化要採取「批判的繼承」的態度問題。

- 「批判的繼承」作為一種對待傳統文化的理念或者態度，沒有甚麼不對吧？
- 提出這個口號的初意不見得有甚麼不對，問題是流行開來以後，逐漸變成了空洞的抽象。特別是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連結起來，這種對待傳統的二分法，我同意杜維明先生的意見，殺傷力太大了。
- 我的立論是不把傳統和現代對立起來的。說到底，現代只有從傳統中來，所以我三十一年前寫的書叫《從傳統到現代》。講傳統，不能不講文化，馬克思主義提出工人階級無祖國，顯然不是以文化為着眼點。從十六世紀到今天，世界的資本主義現代經濟體系形成了。八九年後，東歐、俄國，想改變自己的經濟模式，希望進到資本主義體系中去。中國與美國談貿易問題，其實也是進入資本主義支配的貿易體系中去。簡單說，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就是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文明秩序。
- 所以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怎樣完成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是個常新的課題。晚清以來這一百年，不管枝蔓出多少意外之筆，大題目、中心題旨，還是傳統向現代的社會轉型和文化轉型問題。命定地走向現代化，這個講法很深

切，只是在中國道路未免太不平坦了。

「軟心腸」和「硬心腸」

- 中國現代化的路的确極不平坦，走了不少彎路。現代化的路也確是艱巨而痛苦的。二十世紀是社會轉型的過程，又是傳統解構的過程，香港、臺灣、大陸，都是如此。解構的過程也是重構的過程。解構與重構同時進行。當然談這個過程，有時會感到痛苦，這涉及到傳統價值解體、失落。中國的事，軟心腸不行，我有軟心腸，有時也只好硬起心腸。
- 是的，傳統價值的解體，難免令人有失落感。而且許多問題不好深究。深究，會傷害所愛。打破沙鍋問到底，在學理上應該如此；在心理上，難免有所不忍。
- 德國的社會學家韋伯 (Max Weber) 說過，他研究社會學就是要看看自己能忍受多少，看到真相，有時是痛苦的。研究中國文化也是這樣。中國的繪畫、書法、建築，大家都知道很好，但中國文化中也有許多東西實在不好，它阻礙現代化，不能不揚棄。人應該有兩副心腸，太軟心腸，不敢面對問題；太硬心腸，對應該保護的東西不知珍惜。近年來，很多學者提出重新發掘自己的歷史，探討傳統文化是否有轉化功能。中國兩千多年的發展，當然有變化，從先秦到漢，到宋，到明清，都有不同。但根本上是農業文

明沒有改變。所以清末面對西方現代文明的衝擊，許多人不知所措。某大臣看見西方輪船駛過，風馳電掣，驚悸之餘，不覺暈倒、嘔血。最初理解的現代化，都是關於技術方面的，如造炮、建船、開礦。康有為看到政治制度也不行，才有制度層次的現代化的意識。中國是政教合一，〔不同於歐洲的政教合一〕王權至上，大一統的政治結構與歐洲不同。中國歷史上出了那麼多思想家，但沒有人懷疑過君主專制的政治形式(form)。

- 明末，黃宗羲、唐甄等曾指出過君權泛濫的危害，有的批評得相當尖銳，甚至說周秦以來當皇帝的都是賊，當時被稱作「天崩地解」時代，很大的一股思想潮流。
- 他們所講的不全算是新東西，先秦思想家就提出過。抨擊君權無限擴大，要以百姓之命為命，指出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君主不得據以為私，這種呼籲，代不乏人，根源是民本思想。顧炎武看到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認為三代之盛，可以循還，即回到過去的理想境界。中國一直有一種歷史觀念，以為現在的問題是先前的理想境界被破壞了，改變現狀的辦法和出路，是如何恢復到往昔的理想境界。直到十九世紀末，在西方的挑激下，才真正思考新的政治形式。孫中山說中國四萬萬人都可以做皇帝，這就有了西方民主的觀念。在孫中山手中，中國第一次出現民主的政治形式。新文化運動，是思想革命，是對辛亥革命的

補充。嚴格地說，孫中山不是中國文化化出來的人，誇大一點說，他是一個邊際人，是中西文化的邊際人，也因此，對中西文化都有一定的欣賞，對中國傳統政治，他是革命家，對中國傳統文化，他有一副軟心腸。

共產主義者對中國傳統文化，要決絕得多。我覺得，近人對孫中山在政治革命上的成就估得偏低。有的人以為中國不走共和革命，走君主立憲，情況會好些？這是大費思考的問題。應指出者，中國的文明秩序，歸根結底是以政治秩序為中心的。

- 所以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情結總是擺脫不開。
- 傳統中國，每個年輕人都有一個夢，讀好書，做官。
- 治國平天下。
- 儒家的一套是建構人間秩序的理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 中國傳統社會雖然政治是中心，但民間的空間是很大的，始終存在一個比較完整的民間社會。特別是鄉村，天高皇帝遠，朝廷的政治觸角不一定都能接觸得到。佛教、道教思想的傳播，在民間傳播得更為廣泛。
- 但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力量是絕不能低估的。魏特夫 (Karl Wittfogel) 的《東方專制主義》一書，有一章專門講「國家強於社會」，此書雖有誇張處，但它看到專制主義的本質。中國歷史上，有些朝代，中央權力確實退縮，民間以